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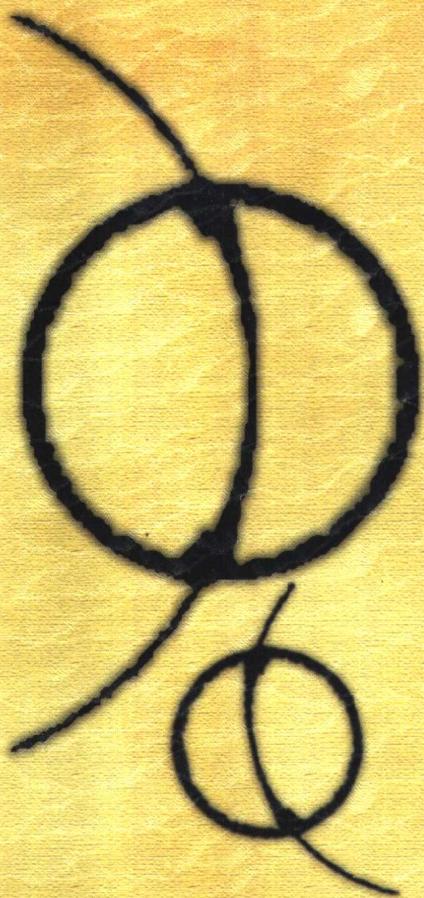
本书通过当下学界前沿领域「历史符号学」的探讨，论及了当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理论角度，重新思考中西学术比较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符号学和解释学在中西比较研究中的作用。全书分四个部分：比较历史理论，比较符号学分析，比较学术评论和2003年符号学之旅。

历史符号学

A
SEMIOTIC
OF HISTORY

< 1

互动知识丛书



历史符号学

李幼燕著

A
SEMIOTIC
OF HIST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符号学/李幼蒸著.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

(互动知识丛书)

ISBN 7-5633-3904-3

I . 历… II . 李… III . 符号学

IV .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86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965mm×1 270mm 1/32

印张:10.5 字数:272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过去十年来是我专注于“史学理论和符号学”问题的时期，除在德国承担有关中国思想史符号学分析写作计划之外，也在不同情况下通过会议、讲演、论文写作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跨学科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旅居加州湾区的这五年里，研读和写作也大致未离此课题范围。今年下半年又在此主题范围内进行多次学术访问：6月在巴黎的“史学理论”考察和里昂的符号学访谈，7月在德国卡塞尔的符号学会议，以及9月在杭州的“符号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会议，等等。现在我把十年来在海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论文和议论汇集成册，以就教于海内外华人学界。希望我的特殊的观察角度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今日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符号学研究的关系。在我看来，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性质和探讨未来学术的方向首先应摆脱现有学术框架的限制，主要是当前西方人文科学教学科研体制的限制。“符号学”和“历史理论”都是在人文科学内突破传统学科限制的工作领域。

广义而言，符号学和历史理论都是“比较学术研究”总类内的亚类。所谓“比较”涉及语言、历史、学科和方法各个方面。顾名思义，比较研究自然超越了各种学科的固有范围，从材料、方法、风格到评估标准。因此，比较研究的方向和性格与专业学科的方向和性格之间具有内在的分歧性，其所需要的教学科研条件往往不是主流学科体系所能现成提供的，文、史、哲、语、宗、艺均如此。换言之，比较研究学者需要超越主流学科框架去进行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额外工作”要求研究者在主流学科规范之外去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并勇于面对由此而来的学术性、职业性，以及甚至是社会性的压力。因为，在今日学术教育广泛商业化的时代，主流学科易于成为学者知识分子获得职业性和商业性成功的运作基础。比较研究则倾向于削弱主流学科领域的“辖权”及其准则的权威性，从而不免影响到学人的职业性利益。不幸，非学术性的利益竞争和学术

制度内的势力较量今日已成为比较学术发展的严重障碍,我们特别可以从已高度制度化的当代西方教育学术界察觉其影响。今日西方教育学术界中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都对思想和学术的方向和方式产生有效的限制作用。

不过,半个世纪以来,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今日中西人文科学理论突破性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如何全面系统地推动比较研究活动。所谓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方向正体现了比较研究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前者指学际方法论和理论的互动研究,后者指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资料之间的有效会通。二者均与学科间现成的严格划界观念相冲突,包括那些已转化为新的“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汉学,甚至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中最具动力性和创发性的领域如符号学和历史理论,其主要任务不在于形成固定的对象和方法的辖区,而在于通过研究各相关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新的视野、对象、任务和方法的运作框架。所以二者是比较研究中的理论运作“指挥中心”之一。比较研究不仅不是企图摆脱传统学科的标新立异之举,反而是以传统学科为基础和对象的学术创新活动。传统学科和比较研究必然在对象材料方面大幅重叠,却在目标和方法方面多有歧异,包括轻重缓急运作策略方面的歧异。比较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如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在于处理人文科学全局性、关系性和(社会、文化、学术方面)应用性的问题,从而表现了更高的分析性和综合性功能。这样,从理论上说,比较研究理论今日实应成为和主流传统学科相互配合、共同进取的学术伙伴,如果学者能够多从追求学术真理,少从追求学术名利角度立身处世的话。不言而喻,按照今日不分真理和利益的现代“智者派”观点来看,这一基本学风准则并不可取。智者派功利主义态度和学术商业制度化的结合已导致今日人文学术思想革新滞碍难行。幸而在学术制度化较为松动的中国学界,比较研究创新的机会似乎可能要比西方学界还来得大些。西方较严格的学科分划制度往往反易于成为学术商业化竞争中派系运作的有效基础,其派系竞争具有制度化保障,非派系性的创新企图极难获得落脚点。在今日西方也不存在一个超制度的个人进取精神传统。本文集对国内读者的期望部分地也在于此。

这本论文集由四个部分组成:比较史学理论,比较符号学理论,中西

比较学术认识论问题以及今年夏、秋之际参加各种符号学活动时对符号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关系所发表的看法。四个部分均有关于中西学术关系和人文理论性质的探讨,反映了十年来我在广义史学(中西传统资料)和符号学(结构和功能分析方法)领域内研究的见解和主张。所论述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中西比较研究的方向的特殊问题,也关系到人类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一般问题。在作者看来,中西比较研究和西方主流学术理论发展是同一人文学术世界的不同部分,必须统一处理。因此,当前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西方主流学术专业训练的范围。就目前阶段来说,在追求全人类人文学术理论突破的共同目标方面,中国学者也许“天然地”担负着比西方学者更重要的,也是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如果他们能够既不囿于学术传统的史地局限,又不囿于西学中心主义的话。其中理智和精神的挑战性首先来自学者能具有与现行学术制度性准则保持适当“距离”的识悟和勇气。商业全球化或商业全面化已成为今日学术竞争机制的基础。学术发展的问题也就成为学术伦理学问题: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应选择什么样的态度、动机和目标的问题。换言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也许并不妨碍(甚至于有利于)科技学术的进步,却肯定妨碍人文学术的进步。然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孔孟伦理学都是基于反功利主义和追求真理的动机而出现的。

2002年8月于旧金山湾区

导论 “历史符号学”的概念

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方式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不能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不仅成为自然科学家不能真正把握人文科学性质的原因,也成为现代早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未能适时提升其理论和方法的原因之一。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进展首先表现在研究者认识到人文科学需要自身独特的方法论系统,而符号学和历史理论各自均为这类方法论探索的组织者。

历史和符号学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有着多种类型。

1. 符号学思想史

首先,“符号学史”既是思想史的重要部门,也是符号学的重要部门。后者本身已经凸显了符号学作为现代理论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2. 哲学史和思想史(含文化史,科技史)的符号学分析法

其次,在一般意义上,符号学的观念和方法有助于我们精化和提升对各种思想史的理解,自然也有助于提升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水准。

3. 历史学的符号学方法

再次,当代符号学的发展促成了历史学内与符号学方法有关的各种新研究领域,如考古学和历史人类学,历史语言学,史籍考据学,艺术史,史学叙事学,史学写作类型学,书籍结构功能分析,史学修词学,等等。今日符号学实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

4. 比较史学方法论

亚洲地区现代化以来,西方现代史学一直是东方古典史学的楷模。然而随着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史学的自我检讨和发展对史学理论

的革新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东西比较史学的含义不再只是东方向西方被动学习的问题,而是按照统一的或相互可沟通的学术运作框架对二者进行深层对比研究的问题。其研究结果必将嘉惠于东西史学双方。在东方史学史中中国史学传统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地位。不妨说,东西比较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对于进行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的任务来说,符号学的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又是最重要的。

5.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探讨运作基地

无论是符号学还是历史理论都不仅是既成学科或固定课题系统的标称,而更主要的是指广义跨学科理论运作的“基地”,其可操作性远比学术实体的积累更重要。在人文科学领域内这两个范围最广泛的比较学术运作基地叠合在一起时,即在形成为“历史符号学”基地时,双方的内容运作范围均会适当缩小,而成为其“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和凝聚的领域。正如我们在相应文章中多次指出的,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无论从跨学科角度还是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上述历史符号学的整体观念尚在形成之中,远非当前西方主流历史理论进展所能充分含括。因此作为历史理论最前沿的历史符号学是明显超越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范畴的概念,可以说其跨学科部分和跨文化部分均超越了西方主流历史理论的核心。因此中国历史符号学研究者在此领域中是和西方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是前于此起跑线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话语的现代化分析或将大幅改变人类历史科学的面貌的话。因此对于以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为主体的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研究者而言,历史符号学范畴尚处于边缘地位。正是中国历史符号学研究的进展对人类历史科学的新方向提供了新的激发力。中国历史符号学将对符号学和历史理论两个领域及其共同组合领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符号学作为学术理论运作基地特别与革新后的中国学术相关联,首先因为作为比较理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学术身份的再规定和其现代化问题。这个艰巨任务的完成只能由真正掌握中文典籍的

中国学者来承担,而绝对不是作为西方边缘学科的汉学有能力来完成的。而在此比较研究过程中的西学一侧也涉及难易大小不同的阶段。在初级比较研究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中学向西学被动学习的问题,西学一侧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一经历了一百年的学术交流过程如今即将告一段落了。中西学术比较研究的较高阶段涉及到理论化提升的问题。此时中学不再是向西学现成理论成就进行模仿,而是需要积极参与西学理论本身的开拓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跨学科理论探讨阶段中之“跨文化参与”的新方向。换言之,当代人文科学跨学科发展趋势已成为一个全球化或人类整体化的问题,也即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方向即将成为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两个并列的主轴,其意义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促进。实质上则是在一定阶段上跨文化部分参与促动着跨学科部分的发展。其运作背景也超出了学术本身而涉及社会性因素。因为西方学术发展方向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认知的问题,而是同时也涉及学术行为的社会性动机和动力的问题。专业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强化与跨学科发展方向形成了相互矛盾。在此形势下,尚未充分制度化的中国学术和其学术革新的历史性任务的内在压力共同使其在中西比较学术中承担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不处于西方学术框架内的中国学术(因此当然不是西方汉学),除跨文化任务外,在推进跨学科理论革新方面也具备了积极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中方原来的被动地位如今变成了主动地位,因为它受到西方学术制度化的不当约束较少,从而能从学术理论革新本身的需要出发来选择思考方向。中西比较学术理论互动关系的第二阶段中,中方于是扮演了越来越主动的角色。历史符号学就是此比较学术互动关系中的典型领域。历史符号学因此不仅是必然的中西比较学术领域,而且是跨学科理论创新强化的领域,同时也是中学与西学在充分平等的地位上相互合作的领域。中西学术比较研究不再是西方理论一方和中方材料一方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共同的学术共同体中相互分工合作,共谋进取。历史符号学遂成为中国学术在中西比较学术关系中发挥理论性参与作用的恰当领域。由西方人负担理论、由中国人负担资料的汉学传统和国学传统,在此新的比较研究领域中是不被认同的。实际情况将是,中国学人既承担资料性研究任务也承担理论性研究任务,既承担中学研究的任务也承担西学研究的任务。

历史符号学因此是强化跨文化的比较历史研究和跨学科的比较理论研究的前沿性领域,其中中国学者的参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所包含的比较符号学和比较史学理论领域(也就是中国符号学和中国历史理论)均属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人类人文科学前沿探索之列。在此过程中,中西比较研究不仅不再是以受到时代和地域局限的汉学为规范,也不再是以西学中心主义为指南。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的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发展不再是以现成西学传统为当然指导的活动,而是在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新型学术共同体。摆脱西学中心主义(含括汉学中心主义)和摆脱以西方学术为当然权威的“留学生文化”是此学术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应进而摆脱以西学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学术等级规范。在此人类人文科学共同体中中学一方的学术资格将不限于掌握中学传统资源的天然条件,而是包括了中国学者掌握西学高级理论的新资格。中学只能作为世界学术界二等公民(考古资料提供者)的地位亦将根本改变。

“历史符号学”作为特殊设定的工作场地、学术规范系统、跨学科方法论调配中心和学际交流中心的学术综合运作机制,具有独特的存在形态和运作形态,其辩证性在于既与现存学术体系密切相关又与其保持充分的距离。前者使其工作切切实实地以人类一切学术史经验为对象、材料和基础,后者使其按照独立的标准、目标和方法对人文知识进行有效的创新。作为广义的比较研究,历史符号学必然在被比较双方原有的规范和目标系列之外形成“第三种”规范和目标系列。比较研究将和被比较的二研究对象形成相互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独立性的三类不同学术体系。也就是说,比较研究不可能被最终归纳到被比较的任一学术系统中去。举例来说,无论是西学系统还是中学系统都不要再能作为中西比较研究课题准则和评价的唯一根据了。作为多维比较研究的历史符号学将进一步凸显这一独立倾向。历史符号学必然是以人类全体知识经验的再综合、再发展为目标的。它与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古典哲学系统的相通处也正在于此。历史符号学在学术交流方面的困难也正在于此。因为其学术运作的价值不可能只按现存学科内公认的准则加以判定,也就是不可能在现行教育科研制度内加以判定。历史符号学的跨学科知识不可能通过单一学科内的专业训练来获得。其客观效果是使单一学科内的学术价值判定程

序相对化。对于以在单一学科等级系统内追求资历累积为目的的学者，跨学科革新可能使其产生的抵触反应是多方面的。学术真理和学术利益之间的永恒矛盾将始终伴随着符号学研究事业。如果说海内外不少学者倾向于仅在单一学科内安置符号学研究以图实用主义地调节上述矛盾，历史符号学的多维跨学科性将揭示各种符号学“专科化”作法的局限性。的确，真正的符号学是一种有关学术方向的挑战，是一种须不时面对各种传统压力的精神磨练。

“一般符号学”，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是以其认识论方向和知识全域性为特征的，因此不同于部门符号学。历史符号学虽可理解作对历史学部门的符号学研究，但在我们设定的层次上，其主要功能相当于一般符号学，或者说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所做的运作方式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哪一人文社会学科不与历史相关？）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符号学的对象是一切实在的材料。符号学的概括是立于“实在”上的科学概括，因此在运作方式上又与古典哲学系统不一样。它尤其不是自上而下的演绎系统，而是自下而上的综合归纳系统。一般符号学、比较符号学、历史符号学等高层符号学理论都是以诸部门符号学和诸学科理论为基础的，是诸具体理论实践的综括、编排和运用，而非什么抽象原则系统的发明和推演。作为最广义的比较理论研究，取一般符号学名称而代之的历史符号学关系到多维的比较理论实践：领域、学科、流派、课题、方法、地域、历史、风格、理论，等等。在这些“维面”上积累了大量人类知识。符号学的比较研究方向则是以这些在门类、专业和学科上存在的知识材料作为新的理论运作对象的。每一符号学运作都是一种比较性研究，都须既依据所比较的对象和相关学理基础，又须对其加以“超越”。其运作结果的形态、作用、评价、规范必然“外于”（如果说“高于”）常规学术。符号学研究在此意义上不会是所比较的常规理论系统的“衍申”或直接发展，后者也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符号学或历史符号学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艾柯符号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和格雷马斯的“语言学基础”都抵触了符号学的内在生命力方向。（参见拙著《理论符号学导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与符号学的本质性联系与后者的远为宏伟的理论任务不是一回事。因此，历史符号学是多维比较理论研究的代称，其每一课题均可能涉及多套比较学术实践，也就是在

研究中形成多种“第三类”运作原则之系列。其辩证法特性在于：既须依据学科专业（利用其知识经验作为研究材料）又须摆脱其学科性运作前提和方法的限制。上述两位当代主要理论家却要坚持这种限制，因此其努力和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90年代以来这两种主要一般符号学理论均停滞不前即为证明。

符号学作为多维比较理论研究不是必须在比较双方的既有框架“内”找到中点，而是要在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符号学的比较研究对于知识把握的方式也必然不同于常规学术。不再是按专家训练方式，成为专业资料维持和创新者，而是按照符号学的新框架对专业材料进行分解、综合和运用。不再是在专业渠道内“安身立命”，而是在跨专业学术区域内进行创新运作。学科专业是以职业制度为存在基础的，职业制度也是以学科专业为内容的。跨学科专业的学术思想运作必然时时脱离职业制度基地而成为社会游离中的理论实践，这是跨学科探索具有冒险性的另一意义。符号学作为学术全面综合创新的理论协调工具，其另一辩证法特性在于不断将跨学科研究成就纳入相关诸学科而形成学科间的科研桥键。当诸相关跨学科科研桥键形成了新的子学科时（如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原相关符号学运作身份开始一分为二：在跨学科项目中形成的方法程序转化为新的子学科或准学科的组成部分以及原一般符号学原则。前者是符号学在具体课题中的实践产物，后者是符号学的理论精神和原则本身。前者为符号学的应用成果，后者为符号学的应用前提和基础。学术应用则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表现层级上。符号学辩证法的最重要特色是理论和实践的多维、多层次互动运作倾向。人文科学的内在整体性要求发展这样的辩证运作，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轴向上推动和平衡人类知识的有效发展。20世纪以来各种一般符号学分别企图以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语言学流派（结构语言学）、科学流派（信息量，系统论）等为基础或模型。历史符号学作为一般符号学打破了这种模式，以避免受到新的理论教条主义束缚。“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后者为人文科学中最具跨学科幅度者（兼指范围和灵活度二者），也是未与任何理论性教条发生固定联系者，即未“挂靠”在任何学科内部者。这样，历史符号学似乎将成为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了。它反映

了今日人类学术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全面整合化。而现存学术格局则是全面专业分工化的。须经过长期不断调整、协适、再组织的过程才可在实质上使其达成既有专业分工又有统一关联的科学系统，以促使世界人文学术推向真正科学的阶段，使其能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同等资格，或使三者发展成鼎足而三的形势。这也是可在实质上提升人类社会福祉的知识论保障。

目 录

序 1

导 论 “历史符号学”的概念 1

第一部分 比较历史理论

前 言 3

历史理论的回顾——兼论跨学科方法论的三个级次 6

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 22

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历史真实性问题 38

史学理论与跨学科方法论 54

关于“三论”与史学研究的随感 59

第二部分 比较符号学分析

前 言 65

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 75

略论中国符号学的意义 91

中国哲学和符号学 103

孔子伦理学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比较研究 126

回顾麦茨：符号学和电影理论 143

论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和后果 158

第三部分 比较学术评论

前 言	173
(一)中西人文学术理论问题	176
福柯、利科、形上学和伦理学	176
当代法国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启示	179
理论、实践、现实——谈谈今日哈伯马斯	185
欧洲人文学术方向与我们的关系	191
学术制度化和思想	198
略谈当前中西哲学关系和中国哲学发展方向问题	202
(二)中国人文学术方向问题	207
论四书不必道贯	207
论现代学术民族主义	210
“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略谈中华文明的物质西化方向	219
人文学术要不要现代化?	225
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之别——再谈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的必要	227
“原料国”还是“加工国”? ——析国学中心论和殖民地心态	232

第四部分 美欧亚符号学之旅(2002):

关于符号学的性质、功能和方向的思考

前 言	237
(一)关于符号学活动的倡议	240
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重要作用	240
致国际符号学学会备忘录(2002年7月)	243
致里昂第八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筹委会学术会议的建议书	244
关于推动中国符号学学术建设的构想	245

(二)讲演和座谈	249
符号学研究的层次结构	249
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异同辨析	254
文学和符号学	261
胡晓明与李幼蒸的对谈:略说符号学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	266

附录 符号学资料

前言	269
符号学研究在中国	270
《符号学手册》编写构想(罗兰·波斯奈尔主编)	281
李幼蒸符号学学术活动简历	305
校后记	315



第一部分

比较历史理论

